



# 中国 精美散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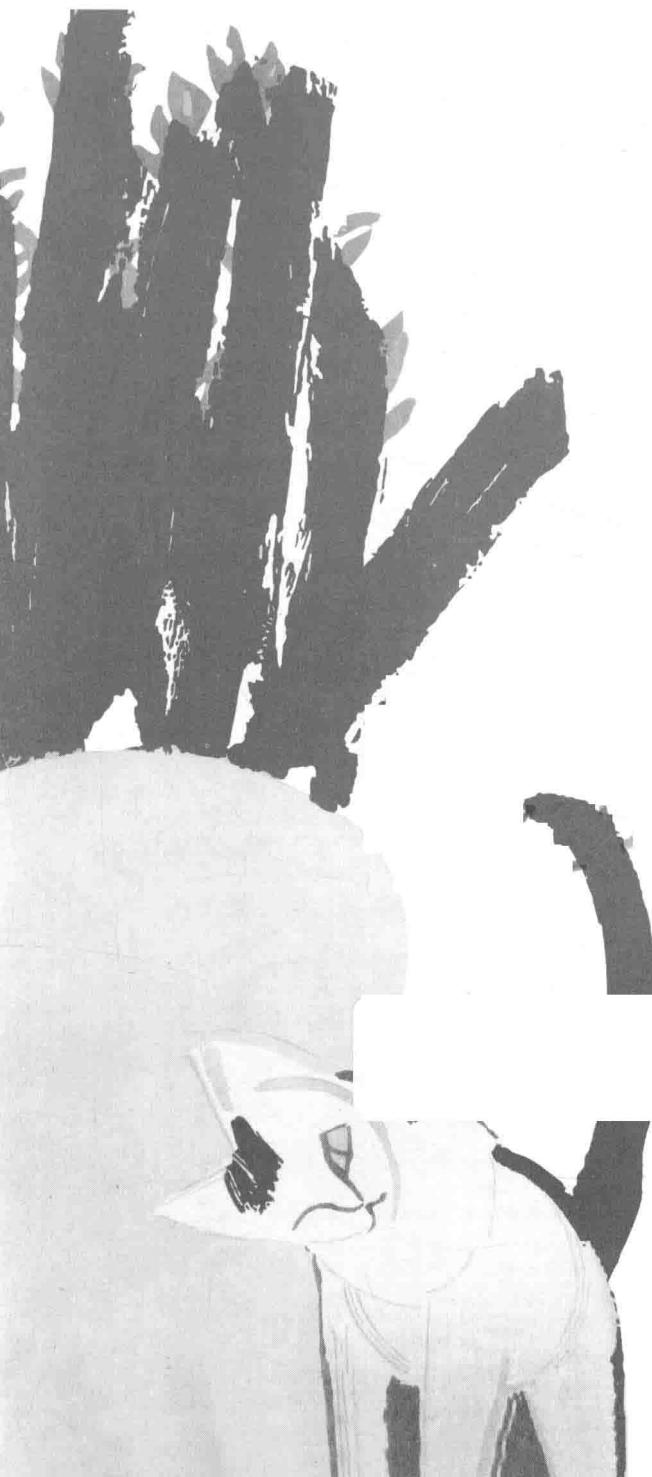
张秀枫 ◎ 主编

幽幽长者／余秋雨 韩金菊／雷达 有如候鸟／周晓枫  
马的眼镜／莫言 水银花开的夜晚／迟子建  
泡在水里的威尼斯／冯骥才 送走三只猫／南帆  
你就这样把草原交给了我／艾平 台北的颜色／江子 关于鹰的事实／王族  
...

2017

中国  
精美散文

张秀枫  
◎主编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17 中国精美散文 / 张秀枫主编 . -- 南昌 :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 , 2018.4

ISBN 978-7-5568-2827-2

I. ①2… II. ①张…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52389号

## 2017中国精美散文

张秀枫/主编

策 划 张 明

责任编辑 张 宇

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

(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 75 号 330025)

www.21cccc.com cc21@163.net

出 版 人 张秋林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鸿祥信彩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 年 6 月第 1 版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20mm × 1020mm 1/16

印 张 24

字 数 360 千

书 号 ISBN 978-7-5568-2827-2

定 价 48.00 元

---

赣版权登字—04—2018—48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 0791-86524997

# 目 录

幽幽长者 .....	余秋雨	001
韩金菊 .....	雷 达	025
有如候鸟 .....	周晓枫	040
马的眼镜 .....	莫 言	066
水银花开的夜晚 .....	迟子建	070
泡在水里的威尼斯 .....	冯骥才	075
送走三只猫 .....	南 帆	079
你就这样把草原交给了我 .....	艾 平	089
台北的颜色 .....	江 子	093
关于鹰的事实 .....	王 族	098
牧草样的生命 .....	杜文娟	105
乳源手记 .....	塞 壬	112
故乡的河 .....	李建臣	121
老街坊 .....	李培禹	124
私人食单 .....	乔 叶	128
乌镇的修辞 .....	汗 漫	137
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		
——怀念史铁生 .....	张守仁	140
千朵花 .....	荆 歌	153
擅于到来的人和擅于离别的人 .....	李 娟	162
条子沟 .....	贾平凹	165
铁锅里的牡丹 .....	李修文	171
划过天空的迁徙之影 .....	唐荣尧	181
塞罕坝时间 .....	李青松	187
冬季 .....	冯秋子	198

河流上的黄昏（外一篇）	李 颖	203
代课老师	冯积岐	217
父亲跟我去打工	刘云芳	225
那一年的白灾害原	张承志	239
三叶一心	金仁顺	248
少年时光一支箭	陈 峰	251
天香桂子落纷纷		
——忆南怀瑾老师的爱国情怀	陈佐洱	265
梅花酒杯		
——写给我的老师蒙万夫	吴克敬	272
回望书	简 默	279
我和我妈	蒋方舟	288
白露微凉	李万华	291
石磨春秋	马步升	298
我的朋友皮洛	谢友鄞	303
暖香醉润兴安岭	陈晓雷	306
清明，血脉里的眷恋	于 丹	314
有些路啊，我陪你走	王小微	318
敬礼，我的兄长	杨春贤	321
在苗圃	孙 郁	329
那年的粉红叫的确良	宇 秀	336
猫事	王 韵	347
大金川上看梨花	阿 来	356
第一张书桌	韩少功	365
行走在东山	范小青	369
一个“技术天才”的沦落	张秀枫	376

# 幽幽长者

余秋雨

## 一

早在 1997 年，我写过一篇题为《长者》的长篇散文，记述当时还在世的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研究员张可女士。这篇文章曾收入《霜冷长河》一书，但在后来编印的选集、合集中都没有收入。理由是，重读时觉得文笔过于散漫拖沓了，不符合我的严选标准。

据我的经验，一个人重读自己以前的文章，如果已经隔了十年，那么，特别在乎的是文笔，而不是内容。内容已经熟悉，而遣字造句、口气表情却还愿意一再玩味，并决定是保留，还是遗弃。

再过十年，也就是相隔二十年，情况又会发生变化。内容已经在记忆中模糊，因此又有了关注的好奇。一关注，一些悠悠微光，又会撞击心灵。这就像墙角淘汰多年的老家具，一直盖着灰布，也忘了是什么东西了，偶尔掀开灰布，居然眼睛一亮。

那天，我不小心掀开了那篇旧文。

张可老师早已不在人世，学院里几乎没有人记得这个名字，各种记录资料中也没有留下任何痕迹。然而，她实在是中国现代女性的一个特殊典型，比现在被传媒反复描写、讲述的那些“才智丽人”“民国女性”更有深度。因此，我决定重写一篇，不仅仅是为了她个人。

## 二

张可老师并不担任课程，属于“教育辅助人员”编制。当初导演

系刚刚成立时，系主任吴仞之先生要求设置一个“研究室”，专职人员只有张可老师一人，后来也没有扩充。张可老师是研究莎士比亚的，如果导演系要排演某部莎士比亚戏剧，她可以提供一些咨询。然而一年年下来，这样的机会一直没有出现。因此，张可老师安静而空闲。来上班时，也独进独出，无人注意。

只有在一种情况下，张可老师会顷刻成为全院焦点，那就是外宾来访。

上海戏剧学院的外宾一直比较多，包括在尚未开放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来的外宾多是表演团体，一行艳丽妖娆，语言激动夸张，多数翻译人员都有点应付不了。即使勉强应付过来了，后面却还有几个绅士模样的高傲理论家，满口故弄玄虚的语言更让翻译人员头痛。在这种情况下，学院领导总会低声吩咐：“叫张可来！”

张可老师一到场，外宾全都安静了，为她的美貌。她肯定比林徽因滋润，比王映霞清秀，比陆小曼典雅。面对外宾，她并不是热烈地一一握手打招呼，而是迎着他们的目光，在他们五六步前站定，介绍自己是莎士比亚学者，很高兴与他们在学院路遇，然后再充满好奇地询问他们来自什么机构和单位。浅浅问答几句，几乎和所有的外宾都粘连上了。面对那几个高傲的理论家，她会故意多谈一些，不露声色地吐露出让对方很难再高傲的专业素养。

她的英语，是标准的伦敦口音，却又增添了美国的开朗和热度。一开口，就让外宾们非常吃惊，却又障碍全消。于是，她立即成了人群的核心。

只要听说张可老师出来接待外宾，学院里的教师、学生、职工都会远远近近地围观，看她的优雅风范。上海戏剧学院美女如云，因此经常会有“民间口碑”式的“选美”。在喊喊喳喳间，入选名单不断更换，但列为第一名的总是她，张可。

### 三

美貌是第一惊讶，英语是第二惊讶，第三惊讶更重大：这么一个大美人，居然是老革命！

她在 1938 年十八岁未到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长期潜伏在美国新闻处和上海戏剧界的一些单位工作。后来据几位认识她的老人告诉我，正是她的美貌，给地下工作带来很多方便，即使身上藏有情报也容易混过去。但是，这一定是没有藏过情报的人的“外行臆想”。在真正的血火战斗中，外貌的作用并不太大，危险始终近在咫尺。年轻的张可就在危险中奋斗了十多年，直到 1949 年新中国成立，真不容易。

新中国成立了，她还不到三十岁，本应风风光光地担任某个单位、某个部门的领导，却又出现了第四个惊讶：她功成身退，决然退党。

这第四个惊讶，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为什么？因为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退党的人很多。有的是叛变，有的是观念产生了严重分歧，有的是流亡海外失去了联系，更多的就是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刻考虑到了家人的安危……张可却是举世罕例：在自己的党隆重执政的时刻决定退党。

仅仅是几天之隔。几天前，共产党员只要被抓住就会被立即处决，她虽然没被抓住，却在心里坚定自认；几天后，共产党员已经可以在大街上昂首阔步，她反而已经不是。在历史转折关头的这种“反转折”，足以震动四方。

关于她的退党，有好几个传闻。

第一个传闻，在地下党员由暗转明的“报到处”，负责接待的领导人是一位级别不低的军事干部。突然见到张可这么一位美貌的“同志”和“战友”，他眼睛特别亮，话语特别多，似乎就像前些天快速攻入一座城池一样，便用很不恰当的语言表述自己的美好意图。张可早就听惯上海街市间对一个漂亮女性更“不恰当”的语言，但今天眼前这个人代表的，却是自己以命相托的组织。能在这样的话语中向组织“报到”吗？凭着在地下工作时养成的那股硬气，她扭头就走。

她不是原来就有组织吗？这就牵涉到第二个传闻了。地下工作的领导，也是一位不错的文化人，看到战争结束，雨过天晴，准备重新安排生活，包括重建家庭。他一直有意于张可，但张可已经结婚。他希望两头都改变婚姻，这在当时的革命队伍中比例极高，但张可不

想进入这个比例。

据我的判断，这两个传闻都未必虚妄。

她的退党，其实也是出于对党的信任。终于掌握政权了，一切都好起来，天下既然已经转危为安，我也就可以投入心中最喜爱的文学艺术了。过去出生入死，不也就是为了建设更文明的社会吗？

这也是她公开表述的退党理由。

于是，上海戏剧学院出现了一个安静的莎士比亚研究者。

在刚刚结束动荡的年代，在上海这样的城市里，一个安静的人，极有可能封存着一部极为精彩的传奇。喧闹的，反倒一眼就能看穿。在革命资历决定社会地位的 20 世纪 50 年代，张可老师似乎变成了一个不懂政治的普通女性，说不定，街道的居民小组长还会给她补一点党史常识的课程呢。

这让我想起了上海戏剧学院的另一位奇特女性，党委副书记费瑛。1949 年之前，费瑛在复旦大学读书，系里的激进学生为了打击“立场模糊的保守势力”，把她当作了重点批判对象。他们不知道，恰恰是这位打扮时髦的女同学，是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很大一个片区的地下负责人，当时那些大家佩服的学生领袖，都是由她在幕后指挥。这种说法大概是不错的，因为直到她退休之后，好几位国家级领导每逢过年过节还会来问候这位当年的“神秘领导”。

但是，张可老师的资历，还比费瑛女士高得多，当然，更不必说学识了。她们这两位传奇女性每次在学院草地间的小路上相遇，总会快步上前，长时间亲热地握手，然后看看周边有没有人注意，再退到树荫下讲话。当时的费瑛女士是学院的实际掌权者，经常要作报告、发指示，气势很大，但一见张可老师，立即变成了温顺的小妹妹。其实在外貌上，张可老师要年轻得多。

## 四

好，现在可以说说我与张可老师的交往了。

我是 1964 年在江苏浏河的一个贫困农村首次见到张可老师的，那时我十七岁，算起来，张可老师应该是四十三岁了。

那个年代，凡是大学师生都要不断地到农村去，名为“社会主义教育”，其实就是从事艰苦的农业劳动。每次下去的时间很长，半年到八个月。刚回来不久又下去了，一轮一轮接得很紧。我到今天还没有想明白，当时上面的领导究竟出于什么动机，让学生不学习，教师不上课，校舍全空着，硬挤到破陋的农舍里长时间煎熬。农民显然不欢迎那么些外来人挤到他们屋子里住，却还是去挤；农民更不乐意那么些城里人拥到他们的田里胡乱折腾，却赶不走。

上级有规定，到农村后必须住在全村最贫困的家庭。而几个农村干部则皱着眉头在选最贫困的几家中最窝囊、最不会讲话的那一家，免得今后不顺心了拿着扫帚打架、驱赶。

我就被分配去了这样一家，一起去这家的还有一位外地干部和一位教师。外地干部叫李惠民，他本就是农村的，却为什么要换一个农村来劳动，一直没搞清楚；而教师，就是张可老师。

这家农民有三间破烂的小泥屋。东边一间挤着房东夫妻和子女，西边一间住着房东年老的母亲，还养了两只羊；中间一间放置农具和吃饭，又养着四只羊。我和李惠民住在中间那间，与四只羊相伴。张可老师住在西边一间，与房东母亲和两只羊相伴。这六只羊都是集体所有的，在这家“借住”，和我们一样。

我所说的这一间、那一间，中间隔着墙。但那墙是芦苇秆加泥巴糊成的，六只羊的叫声全都听得见。比羊叫更刺耳的是老太太连续不断的咳嗽声，这实在是让张可老师受罪了。她住的那间泥屋，特别小，老太太的床又窄又脏，紧贴着张可老师的床。张可老师挂了一顶从上海带去的白帐子，但两只已经脏成灰黑色的羊就蹲在帐子边，臭气和霉味扑鼻而来。

这就是我和张可老师初次见面的地方。

我看到这间泥屋的景象就立即大声说：“不行，老师，你决不能住在这样的地方！”

我当时只知道她是我们学院导演系的教师，还不知道她的名字，但看到这么一个恐怖的住所，一下子就产生了一个男学生要保护女老师的责任感。

她竖起食指“嘘”了一下，让我小声一点。随即问了我的名字，便轻声说：“规定要住最贫困的人家，只能这样了。要换，也没有理由。”

我说：“我小的时候在家乡农村长大，也从来没有见过这么腌臜的房子。”

“腌臜，这个词用得好。”她说，“你家乡在哪里？”

“余姚。”我回答。

“余姚？好地方。”她说，“考考你，你知道同乡王守仁吗？”

“考考你”，这是一个老师最能向学生表明身份的说法，在这烂泥屋里听到，我特别高兴。

“王守仁就是王阳明。心外无理、知行合一、致良知。”我说，稍稍有一点学生式的小卖弄。

她这下认真看我了，满脸微笑地说：“我只是随口一问，你就端上了王阳明三个最重要的学说，真要刮目相看了。”

## 五

刚下乡时，正逢雨季。村里有规矩，天一下雨就要开会，开会的地方离我们的烂泥屋不近。这就太难为张可老师了，因为门外一片泥泞，她走一步摔一跤，浑身是泥。其实，她到河边洗漱，也寸步难行。雨停了，就要下田劳动，但田埂还是泥泞，她仍然无法行走。

这就需要我来搀扶了。我小时候在农村时成天赤脚玩泥，不把泥泞当回事。因此，几个月中，我成了张可老师最趁手的拐杖。

对于吃饭，当时还有一个奇怪的规定，尽管交了饭费，但决不能吃饭桌上的任何荤菜，连农民在河沟边自捞的小鱼小虾也不能动。幸好这家人家没有这种麻烦，下饭的菜永远是一碟盐豆。为了怕费油，青菜都不炒一个。几个月下来，我们的脸色已惨不忍睹。

张可老师看着我说：“你正在长身体，不能长时间这样。”但是，又能怎样呢？她叹了一口气，说：“现在上上下下都喜欢摆弄苦，炫耀苦，却忘了当初革命是为了什么。”

我当时一点也不知道，说这句话的人，最有资格说“当初”。

也有下雨不开会的日子，我们就可以在烂泥屋中间那一间的门内，

看看书，说说话。

那天，我在一角看书，张可老师从她的泥屋子走了出来。只是远远地瞟了一眼，她说：“不要只读兰姆，要读原文。”

这下我脸红了。我确实在读兰姆姐弟（Mary Lamb and Charles Lamb）合编的《莎士比亚故事集》，从外文书店买来的英文版。原来以为已经很牛了，却被真正的莎士比亚专家一眼看破。她怎么粗粗瞟一眼就能认出哪一本书呢？这就叫专业。

我嗫嚅着：“莎士比亚原文是上了年纪的英语，很难。”

“你真不知道该原文的乐趣有多大！”她说这句话的时候，满脸都是光辉。

“如果由中国的剧团来演出，用谁的译本比较好？”我问。

张可老师说：“一般用朱生豪的，他只活了三十二岁就翻译出了二十七部，令人感动。但也正因为太匆忙，有点粗糙，对那个时代的神韵传达不够。这些年北京大学吴兴华等人进行了校译，质量就提高了。梁实秋倒是翻译全了，翻得从容不迫，但少了朱生豪的那种激情，又不太适合演出。”

顿了顿，她说：“记住，现在中国最好的翻译家是傅雷，我们很熟。你听说过他的儿子傅聪吗？大钢琴家……”

我知道，这就是上课，就恭恭敬敬地找了一把小小的竹椅子摆端正，请她坐下，我就坐在对面三块叠着的泥砖上。她一笑，便坐下了，显然，她也愿意在这被大雨封住的小泥屋里讲这样的课。以后每次这样一坐，彼此心头就都响起了学院的铃声。

“你能读兰姆，也算不错了，那书是在福州路外文书店买的？”张可老师问。

我说：“兰姆是我的中学英语老师孙珏先生吩咐买的，现在这样的书买不到了，满架都是《毛泽东选集》的各种外文版。前两次下乡，我为了学英语，把《毛泽东选集》的英文版读了一遍。”

“那是偷懒的办法。”她说，“中国人的思维，中国人的词汇，猜都猜得出来。读英语，先读狄更斯，再读莎士比亚。”

“你们系里平常上一些什么课？”她问。

“太差了。当时是以全国最难考的招牌把我们吸引来的，一听课，多半是政治教条。我们等着顾仲彝先生来讲贝克技巧。”我说。

她笑了一下，说：“贝克不重要。技巧只是技巧。”

“亚却呢？”我追问。贝克和亚却，都是美国的编剧教师，小有名气。“也不重要。”她说。

“劳逊呢？”我又问。劳逊的书，已在中国翻译出版。

“稍稍好一点，讲到了结构，但还是浅，而且啰唆。”她说。

她三下两下，就把我们所企盼的课程全给否定了。其实按照当时已经泛滥起来的以政治压倒一切的极左思潮，这些课程也不可能进课堂了。这就像一群应招女婿还没上门，就被她婉言谢绝了。当时我听了，是心存怀疑的。

她看出了我的怀疑，就讲了一段话：“艺术的最高处，不在技巧。莎士比亚是一位伟大的诗人，向他学什么编剧技巧，实在是委屈了他。而且，学戏剧文学，目光也不能只在编剧。中国话剧的发展，关键在导演。戏曲，关键在演员。一切都靠时代力量和个人天赋。”

“那是不是要学习斯坦尼和布莱希特的表演理论体系？”我问。

“也不必。他们两人都是好导演，但是一钻到理论里就夸张了，把架势撑得太大。凡是艺术家自己搞的体系，都不能太相信。”她说。

后来我每次回想，都感谢张可老师在我刚懂事的年纪示范了如何做减法。这种减法思维，使我毕生受益。

别的老师喜欢把自己知道的一切全都当作宝贝往学生肩上压，张可老师正相反，以自己的阅历衡量轻重，对比高低，去芜存菁，早早地为学生减省负担。并且，把减省负担当作一个重要的学术门径，启发学生。

我想，如果不是那间雨中烂泥屋，而是一直在高楼深院里接受一系列正规教育，那么，我不知道会在大量“看似重要的不重要”中浪费多少年月。

有一天又下雨，她与我谈起了文学。她对中国现代小说全都看不上，包括一系列已经上现代文学史的“经典作家”在内。

“都不大气，缺少人性和神性。只是社会化、观念化、个人化的东西，

显得神经兮兮又可怜兮兮。”这两个“兮兮”是上海女性的口语，一说出口，她就笑得很开心。

“您会不会也去翻翻当代小说？”我问。

“翻得很少。粗粗的印象，我觉得陕西的作家比较认真，像柳青、王汶石。看起来王汶石更好一点，笔下有一种爽朗的劲道，可惜题材太窄。”

我对她读过王汶石有点吃惊。

接下来是她问我了：“外国小说你喜欢谁？”

“法国的雨果，俄国的契诃夫和美国的海明威。”我说。

“我知道了，你不喜欢精神撕裂型、心灵忏悔型的作品。”她说，“正好，我也不喜欢。”

就这样，过了五个月。一天上午，乡里一个通信员推着一辆很旧的自行车来通知，说上海戏剧学院的领导来慰问下乡劳动的师生，今天就不用下田劳动了，大家到南边一个旧祠堂里去集中，中饭就在那里吃。

这是让人高兴的事，我陪着张可老师走了不少路，找到了那个旧祠堂。来慰问的领导就是费瑛书记，她一见张可老师便着急地迎过来，握住手之后又一遍遍上下打量着，那表情的意思是，真不该让她在这里待那么久。

分散在各村的同学和老师重新见面，都非常开心。这时才发现，旧祠堂的一角正烧着两只大锅，飘出阵阵无法阻挡的香味。原来，费瑛书记听说我们在乡下不仅劳动艰苦，而且吃得很坏，就决定来一次最实际的慰问。那就是请学院食堂的厨师一起下来，办一次聚餐，每人分两块草扎肉、两个馒头，进行“营养速补”。

所谓草扎肉，就是把五花肉切块后用一根根稻草扎了，放到锅里焖煮。煮烂了也不会散块，掂起稻草分给各人。由于已经有五个月没有好好吃饭了，很多男同学打赌，能一口气吃下十块。女同学只闷笑，心想十块怎么够。看到同学们的狼吞虎咽，费瑛书记眼泛泪光，轻轻摇头。张可老师只吃了一块肉，把另一块放到我的盘子里，就起身又到费瑛书记那里去了，我连推让的机会都没有。

这时，在我们邻村劳动的胡导老师挨近我，问：“你知道为什么费瑛书记这样尊重张可老师吗？”

我摇头，看着胡导老师。

胡导老师打趣说：“看你和她在一起劳动快半年了，她都没有透露。可见我也不能透露，这是地下工作的规则。”

看我发呆，胡导老师又加了一句感叹：“传奇啊，了不起！”

## 六

“文革”开始后，舞台美术系的同学带头“造反”，组织了一个叫作“革命楼”的造反组织，全系大约有三分之二的同学参加。表演系也有同学“造反”了，大约占全系人数的三分之一。我们戏剧文学系和导演系的同学没有人“造反”，就由我带领着，对抗造反派同学临时学来的暴行，例如批斗老师、抄家、打砸抢。他们开大会，我们也开大会；他们刷出了打倒谁的标语，我们就紧挨着刷出正面标语；他们准备要抄哪个老师的家，我们先赶到一步，贴出布告“这家已由革命群众查检完毕”；他们要烧图书，我们就围成三圈高喊反对的口号……

我的这些对抗行为，被造反派称为“保皇派代表”“三座大山之首”。但有一段时间，毕竟是反对暴力的师生要多得多，我一时广受拥护。有一次，在红楼前的热闹通道口，一位年迈的女教师大声表扬我是“正派的好孩子”，边上很多人鼓掌。我正为“孩子”的说法烦恼，肩上被拍了一下，一个熟悉的声音传来：“最近有没有见到李惠民？”

我转身一看，居然是张可老师。李惠民，是我们在农村同住一家的那位地方干部，几乎忘了，她怎么突然提起？原来，她是想用一个陌生的话题把那个女教师的表扬和别人的掌声打断，把有可能发酵的对话打断，把我引开。

我跟着她走到一个无人的角落，她轻声而快速地说：“你应该赶快躲起来。在学院里我们是多数，但这是暂时的，从中央的势头看，会有大翻转。你不能站在风口浪尖上。”说完，她拍拍我的手臂，转身就走了。

其实我也在关心形势，已经预判造反派会很快压倒我们。既然这样，

张可老师说得对，应该往后退。正好我爸爸被他们单位的造反派打倒了，我要天天代笔为爸爸写交代，就从学院隐退了。

此后我经常想起突然拍肩又突然转身的张可老师。她在“文革”中，没有引起造反派的注意，因为她不是党员，不是干部，也不是正式教师。她原来所在的导演系没有造反派，而后来她的编制又划到了演出科，那是一个由裁缝、木匠组成的舞台服务机构，没有人对“文革”有兴趣。但是，如此安全的张可老师那天对形势做出的判断，实在是一种充满政治经验的远见。她喊一声陌生人的名字把我引出来的情景，让我联想到了某些间谍片。

当时我的遭遇已经是一片凄风苦雨，爸爸被关押，叔叔被逼死，全家八口人失去经济来源，而我又是大儿子。正在苦得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上面又下达通知，立即下乡劳动。

下乡不久前的一天，我拿着造反派掌权者为我做的“长期对抗文革”的最低等级思想鉴定，丧魂落魄地在学院里走，又遇到了张可老师。与上次一样，她喊了我名字后，先从一个陌生人开头：“我家邻居是你中学时的同学，最近从北京回来了……”边说边往小路引。看到周围没人了，就转入正题：

“听说你们又要下农村？”她急切地问。

“是的，已经动员过了。”我说。其实，动员到出发的时间很短，这两天我正在想办法用卖书所得的三元钱买一套防雨的棉衣，但还没有买到。

“去多久？”她问。

“说是一辈子。”

她突然沉默了，低下头去一会儿，又抬起头来。

“一辈子，让带书吗？”她艰难地问。我猜度刚才她沉默时也许会想起我们在烂泥屋里靠谈论书籍熬过了半年的往事，但这次是一辈子，而不是一年半载。

带书，这事我也在想，前几天卖书时还咬着牙齿留下了几本，因而就对张可老师说：“让不让带书还不知道，总可以带几本吧。”

说是这么说，心里却明白，如果允许带几本，也一定不是张可老

师所说的那种书。

“一辈子，与父母商量了？”她又问。

刚问，她又露出一个抱歉的表情。因为在那个年月一切命令都无法与父母商量，父母只有听命的份儿。而且我想张可老师也听说了，我家已陷于大祸。

她叹口气，轻轻地拍了拍我的手臂，说：“好好照顾自己！”

没想到，不是一辈子。

1971年，由于林彪事件、重返联合国、准备欢迎美国总统，“文革”的逻辑断了。在周恩来等人的努力下，文化建设悄悄地代替了文化破坏。

复课、编教材、编词典、办学报，都火烧眉毛般地着急推进。这是另一种逻辑的启动，极左派想阻挡也比较困难。我们也就随之从农村回到了上海。

上海戏剧学院遇到的第一件好事，是抽调专家去编《辞海》，抽到的第一个人，恰恰是张可老师。她当然合适，《辞海》里的很多条目都能够参与。

接下来的事情就分好几个等级了。复课招生是第一等，既热闹，又有点权；编学院里的专业教材是第二等；与外校一起编通用教材是第三等；到外校去编我们学院用不着的教材是第四等。我分到的是第四等，到复旦大学去编我们学院用不着的鲁迅教材。第四等倒无所谓，比较麻烦的是复旦大学太远，去一趟要换好几路车，没人想去。我同意去，是另有所图，想利用复旦大学图书馆的外文书库来充益我已经独自在编的教材《世界戏剧学》。

从我们学院到复旦，我看到教育恢复的势头十分振奋。有趣的是，所有的造反派骨干成员，全都置身在这个势头之外，他们气鼓鼓地等待着一场“反击”运动。

那天我回学院，看到教育楼的红砖外墙上新贴出一条标语：

不要资产阶级文痞，

宁要无产阶级文盲。

这种标语在“文革”中看得多了，但这次，显然是针对着教育恢复的势头来的。